

黄易汉印收藏研究

臧 坤

内容提要：乾嘉时期金石收藏活动盛行，黄易生逢其时，受到家学金石收藏渊源以及其师丁敬推崇汉印的影响。黄易在秉承家学、继承师学的基础上对汉印展开了一系列的收藏活动。纵观黄易与友朋之间围绕汉印展开的相关互动，黄易对汉印的收藏并非秘而不宣，收聚蓄藏也并非黄易的真实目的，其更多的学术旨向，是将对汉印的收藏引向以师法汉印为主导的篆刻实践当中。

关键词：黄易 汉印 收藏 篆刻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大业，号小松、秋盦，又斋号秋景盦、小蓬莱阁等，浙江仁和县（今杭州）人。乾嘉时期著名的收藏家、金石学家、书画篆刻家，被誉为“金石五家”^[1]和“西泠八家”之一。黄易积极搜访古代金石遗文，并对其进行相应的保护、收藏与研究。黄易在发现和保护古代碑刻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柴萼在《梵天庐丛录》言及：“钱塘黄小松司马嗜奇好古，每游一处，必访求古碑之存亡，厥功甚巨。以其余力，收藏秦、汉铜印，装订成帙。”^[2]正如柴萼所言，黄易的古印收藏虽仅以“余力”为之，但作为黄易收藏的一部分，也具有极高的成就，其中尤以汉印最为突出。其在印学方面辑有《黄氏秦汉印谱》（《秦汉铜印》），又自辑刻印为《种德堂集印》《黄小松印存》。

一、收藏渊源：家学与师承

黄易出生于书香门第，幼年时期便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其父黄树穀在黄易八岁（1751）时去世，黄易与父亲的交集也仅仅停留于其幼年时期，然而其父对于金石的收藏，却对黄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史稿》称：

（黄易）父树穀，以孝闻，工隶书，博通金石。易承先业，于吉金乐石，寝食依之，遂以名家。^[3]

[1] “金石五家”，指清乾嘉时期的钱大昕、翁方纲、王昶、孙星衍、黄易。

[2] 清·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二十，中华书局1926年石印本。

[3] 赵尔巽：《清史稿》，民国十七年（1928）清史馆铅印本。

对于黄树穀的收藏活动,张照曾言:“于金石文字搜索不遗余力,丁星断烂,宝若性命。”^[1]可以看出,黄树穀对于金石收藏赋予极度的热爱,其平生应有不少的金石收藏,在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中就收有其父所遗留下来的多件藏品。黄树穀还藏有《孝慈堂印谱》,并亲为题跋。这种家学环境可能是黄易产生金石兴趣的起点。黄易秉承家学,其斋号也有继承家学之意,翁方纲《黄秋盒传》言:

父树穀,以篆隶名家,世称松石先生者也,故君字号小松。^[2]

黄易因父亲被称为“松石先生”而自号小松,透露出他欲继承父亲的学问和遗志的心迹。黄易的斋名“小蓬莱阁”也有秉承家学之意,“小蓬莱阁”原为黄易七世祖黄汝亨(贞父先生)读书南屏书室,在杭州西湖雷锋之麓,后毁,黄易以此为名有追思先人之意。^[3]

如果说家学是黄易金石收藏潜在的影响,促使黄易能够较早接触到金石。那么黄易对于汉印的收藏与研究则少不了其师丁敬的引领,黄易约19岁开始师从丁敬学习篆刻。其师丁敬与黄树穀是世交,对于二人的交游,黄易在家藏《麻姑仙坛记》拓本题跋中云:

丁泓龙先生与先子扞碑论古,晨夕过从。先生之手迹宜乎不少,然寒家五十年来书卷零落,惟此岿然尚在耳。拓本固可宝,而先生词翰尤不易得。重加装池,永为枕秘。^[4]

在黄易的印象中两人“扞碑论古,晨夕过从”。可见其父与丁敬关系非同寻常,经常扞碑论古,黄易深处其中,耳濡目染,多少都会有所影响。清人十分重视汉学,清代中期以汉代为典范的思潮渗透于学术、艺术等各个层面,丁敬的篆刻就有明显的“尚汉”主张。^[5]因此,丁敬也十分重视对于汉印的学习,这一点在丁敬篆刻的边款中多有论及:

古印留遗莫精于汉。(“寿古”印款)^[6]

秦印奇古,汉印尔雅,后人不能作,由其神流韵闲,不可捉摸也。(“王德溥印”印款)^[7]

丁敬对遗存下来的古印当中,对汉印尤为推崇。丁敬作为浙派创始人,更是黄易篆刻艺术的领路人,对黄易篆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黄易不仅在篆刻实践中对其师有所继承,其师注重践行

[1] 清·张照:《题识》(拓本),《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一册。

[2] 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黄秋盒传》卷十三,清李彦章校刻本。

[3] 秦明主编:《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汉魏碑刻特集》前言,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4] 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第八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5] 关于黄易的篆刻审美观,可参白洪锦《清代金石热对黄易印风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硕士论文,2009年,第12—29页。

[6] 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717页。

[7] 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715页。

的学术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丁敬对古代遗物曾做过大量的收集，其中不乏对古印的收集。

二、汉印收藏：来源与去向

黄易注重访求汉印，曾在乾隆丁酉（1777）秋与朱筠一同访汉印于京师。朱筠《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汉石经残字》跋：

乾隆丁卯（应为丁酉），余同钱塘黄小松访汉印与京师，留守卫曲巷之草庵。^[1]

朱筠能够与黄易一同访汉印于京师，应与朱筠的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朱筠治学以汉学为旨归，张学诚在《朱先生墓志铭》中曾言：“至于文字训诂、象数名物、经传义旨，并主汉人之学，以谓与作聪明，宁为墨守。”^[2]朱筠幕府大力提倡汉学，这也使其幕府成为汉学产生和聚集的重要场所。

对于收藏活动而言，出资购买是藏家获得藏品较为直接的方式之一，在黄易《嵩洛访碑日记》中，就记录了其购买汉印的情况：

（九月）初六日……市间得汉镜，文曰“宜君乐”“乐未央”“大富昌”……又购唐镜一，古币四，汉印二。^[3]

通过商家之间的买卖使得汉印流通于市，这种无序的递藏导致藏品分布较为零散。黄易在日记中指出于市中购得两枚汉印，每次仅能购得较少的藏品，这在收藏活动中也较为的普遍。这也导致了一些藏家更热衷于寻求资深藏家的藏品，其藏品之丰富往往能引起他们的极大关注，黄易在《题王莲湖汉铜印谱》中就曾记录了这一现象：

济宁吴氏所藏古铜印章五百余，谱首郑居实序。汪水部初庵、潘中翰毅堂见而心艳，屡求卒不可得。近时印渐散失，易初得十余。居实子鲁门，自金乡持来六巨椟，为印五百四十，又小匣，为印二十有七，吴氏物居多。易力薄，留小匣，趣王刺史莲湖购六椟。^[4]

济宁吴好礼世德堂所藏古铜印章500余枚，其丰富的藏品使得汪启淑与潘有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屡次寻求终无所获。此后吴好礼世德堂所藏印章散失，黄易初得10余枚，后郑鲁门自金乡持来500余枚，其中多为吴氏旧藏，黄易因为资金问题仅购得其小匣中27枚印章。虽然黄易未能获得全

[1] 清·黄易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题跋书影见于秦明主编《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汉魏碑刻特集》，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2] 清·朱筠：《笥河文集》卷首，清嘉庆二十年（1815）振华吟舫刻本。

[3] 清·黄易著，毛小庆点校：《嵩洛访碑日记》（外五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4] 清·黄易：《秋盦遗稿》，《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部的藏印,然王莲湖的大量购藏也能让黄易有机会获观这些古印的全貌,对于黄易而言这何尝不是一大幸事,通过这种集中出让的方式,也使得古印在金石收藏活动中变得流传有绪,更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相关研究。

黄易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每次获得的古印数量并不是非常的可观,但黄易对古印的收藏未曾间断,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月二十八日,翁方纲之子翁树培就曾写信给黄易询其新近所得汉印之事:“并闻新得刀布若干,汉印若干,不知可一一拓以见赐否?”^[1]数次的积累自然也能形成一定的规模,从所辑《黄氏秦汉印谱》所收录的印章来看,其对于古印的收藏规模还是非常可观的,对于黄易的印章收藏,伊秉绶曾言:“篋中多蓄古器物,累累官印炎刘铜。”^[2]

黄易亲身寻访以及出资购买虽然可以直接获取古印的收藏,但这样的资源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机遇,有时还会因资金的不足导致与藏品失之交臂。个人的收藏毕竟有限,而想获观更多的藏品资源,与其他藏家的交流就显得极为重要。潘有为在当时以古印收藏最为著名,对于像潘氏这样的大收藏家,黄易自然少不了与他的交流。在潘有为致黄易的书信中曾言及:“汉印检出一枚奉上,转盼便不合用,仍归我斋,亦佳话也。”^[3]除此之外二人围绕汉印展开的交流还有很多,潘有为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中就曾多次写信给黄易,言及所藏印章以及印谱之事:

为新得汉铜印六百余颗,暇当全印以报君惠耳。^[4]

为处所藏汉印,缘印谱之名未定,印格未经付梓,而用印复不得人以代,以此少稽。^[5]

所藏秦汉铜印,前后共得八百余颗,其气味稍涉唐宋以后者,即不入选,以此尚存七百廿余颗,足下仅以三百颗羨余,或亦轻量天下士耶?……艺堂新赠芝山明人尺牘一百幅,健美健美。又赠我汉铜印两三枚,皆可宝也。^[6]

想必在此之前黄易对潘氏的藏印就有所了解,并向潘氏索要他的藏印谱,而潘氏也在回信中指出由于印谱之名未定,以及印格未经印刷等作罢。此后黄易对此事应一直有所关注,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潘氏的回信中还能看到潘氏因缺乏印泥,导致印谱迟迟未成:

看篆楼所藏秦汉印七百余,苦无印色,是以迟迟,近日朱砂已得,有同年恒益高者善制,制成当得佳本奉寄。^[7]

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潘氏又因印谱尚未凑齐一千枚,而向黄易寻求帮助:

[1] 《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七册,国家图书馆藏。

[2] 清·黄易著,毛小庆点校:《嵩洛访碑日记》(外五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页。

[3] 《黄小松友朋书札》第六册,国家图书馆藏。

[4] 《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五册,国家图书馆藏。

[5] 《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五册,国家图书馆藏。

[6] 《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五册,国家图书馆藏。

[7] 《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五册,国家图书馆藏。

铜印尚未满千，尊藏能足岳添流，更感。^[1]

弟集铜印千枚，择其气味稍差与模糊欠真、不入赏鉴者割置百余，以此尚未盈千，必加意拓之，就正有道。^[2]

对于潘氏的请求，黄易是年便作出了回应，潘氏回信言：

昨廿四日接手示，兼承寄赐铜章四十枚，内有精美非常者，顷与芝山细赏，不能去手，古之朋锡其何能过此？可胜道意耶？^[3]

而对于黄易的请求直到1793年潘有为才给予奉上：

印谱多年鹿鹿，未暇拓得，屡札需此甚急，谨将案头手披底本专上，另有新购汉印数十枚未补，俟有定本，续继何如？^[4]

为了获观潘氏的这部印谱，黄易不仅为此寄出了所藏铜印中40枚印，来助力潘氏印谱尽快完成，黄易还为此等待了至少15年。黄易对于潘氏印谱的持续关注不仅是为了获观潘氏众多的古印收藏，更多的在于可以一睹潘氏所藏古印的艺术风貌，这也是作为一名篆刻家所表现出的对于艺术资源的强烈渴望。古印钤盖成谱，不仅方便学者对于印文的学习与借鉴，同时也使得藏印以另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得以有效的保存。时过境迁，原印可能会分散遗失，而印谱中保存的大量钤盖印文对于日后的研究而言就显得极为重要。

乾隆五十九年（1794），黄易得到一枚“桂”字古铜小印，赠桂馥，此事一时传为金石佳话，翁方纲作诗记之，圈内友人也多有唱和。^[5]黄易将藏品赠予桂馥，使藏品因黄易有了新的递变，而与众多藏家的藏品命运一样，黄易收藏古印最终也散于他出，阮亨记载：

积古斋旧藏秦汉铜印十种，在浙江府署时曾邀同人分赋，后续得黄小松易所藏四百余印，选其完善者二百钮于己已贡入内府，余印择其中姓名有见于列史者，自汉至唐，共得二十八钮，予兄自为《印记》，命侄常生释注之。^[6]

黄易所藏古印后来大多归于阮元，随后又贡入内府。阮元所提及的黄易所藏400余印，汉印应占多数。黄易通过收藏活动将零散于各处的古印实现了阶段性的聚集与保存，而随后以集中出让

[1] 《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七册，国家图书馆藏。

[2] 《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七册，国家图书馆藏。

[3] 《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七册，国家图书馆藏。

[4] 《黄小松友朋书札》第十二册，国家图书馆藏。

[5] 朱珥著：《蓬莱松风：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99页。

[6] 清·阮亨：《瀛洲笔谈》卷十二，清嘉庆年间刻本。

的形式让黄易的藏印得到了有效的保存,对黄易而言这是幸运的,对于学界而言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三、蓄物资学:理论与实践

黄易收藏汉印,与汉印有较多的接触,翁方纲在《黄秋盦传》中就言及:“多蓄汉印、诸吉金杂器物款识,摩挲终日不去手。”^[1]汉印体型小巧,方便把玩,作为篆刻家的黄易,应对汉印印文所具有的艺术特征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其在《柿叶斋两汉印萃序》云:

两汉刻印,无体不工,萃成一书,昔称顾氏《集古印谱》,然梨枣雕镂,略存形似。汉篆一波一折,妙入精微,木刻何能仿佛?鲁门先生以美石摹镌,逼真古法,岂惟远超顾氏之书,直令两汉精神尽来腕底。有功后学,正复不浅。先生深思好古,学有本源,余知之独深。每叹其怀才不遇,今见此书,真堪寿世。虽吉光片羽,亦足以长留天地间也。钱唐黄易。^[2]

黄易指出顾氏《集古印谱》使用梨枣雕镂汉印,只是对汉印形似的保存,其入印文字的波折之处,不能达到妙入精微。并指出鲁门先生以美石摹镌,直逼古法,得以表现两汉精神。黄易指出梨枣摹印的不足,并肯定了以石摹镌古印的重要性,这种对以石摹古的认识,想必与黄易自身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

汉印有官印与私印之分,两类当中都存有艺术价值较高的印章,黄易约在乾隆六十年(1795)为王穀作《题王莲湖汉铜印谱》中就有所论及:

官印“大司马建威校尉”“鹰扬将军”“彭城左尉”,私印“李广”“任贺”等章,皆极为精妙。“翱”字一印,易辨为谢翱物,高贤手泽,宜同西台竹如意并传于世。莲湖得兹多宝,足以自豪,手成一谱示易。茶熟香温,闲窗评赏,真堪与关中松谈阁、淮阴程荔江诸谱后先争胜,辉映艺林,不独海内嗜古之士一时妒羨已也。^[3]

黄易充分肯定了《王莲湖汉铜印谱》当中所收官印“大司马建威校尉”“鹰扬将军”“彭城左尉”,以及私印“李广”“任贺”等印章的艺术价值。黄易对于印章的评判标准我们无法获知,而其对于汉印的认可,应更多地来自其对印文艺术价值的充分肯定。此外黄易还辨别出“翱”字私印为谢翱之物,使得古印与古人之间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在无形之中也提升了此印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也很好地反映出,在古印收藏中龚自珍所提出的“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4]这一说法。

[1] 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黄秋盦传》卷十三,清李彦章校刻本。

[2] 清·郑文忠摹刻《柿叶斋两汉印萃》四册本,上海图书馆藏。

[3] 黄易:《秋盦遗稿》,《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 清·龚自珍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5年版,第267页。

将收藏的印章进行钤印并装订成谱，是当时藏家用于保存印文较为普遍的做法，黄易在致顾文铎的书信中就曾对印谱有所提及：

兹闻有陈贯霄先生精于篆刻，乃下文拙作，何敢匿丑，谨以弟刻自用之印印出一册请正，乞寄之。《汉印谱》及诸拓本俟陆续再寄。^[1]

黄易所辑《黄氏秦汉印谱》（又名《秦汉铜印》）。据韩天衡记载，《黄氏秦汉印谱》中藏印部分为黄氏旧藏，大部分为吴好礼旧物。全谱存官印94方，私印280方，合计为376印。成书当在嘉庆初年。^[2]对于此谱柴萼《梵天庐从录》卷二十《黄小松、张叔未诸家之集古印谱二则》记载：

钱塘黄小松司马嗜奇好古，每游一处，必访求古碑之存亡，厥功甚巨。以其余力，收藏秦汉铜印，装订成帙。乾隆甲寅，自署题签。谱无卷目，首列官印，有将军印章八钮，又“颍州郡长”。私印“曹苗”“公嗣”两印颇为奇特。共计官印七十八钮。周秦方寸玺仅一小玺有“臧疫讯玺”。汉印有“黄易”二字，白文古拙，殆因得此印以改名者。私印近三百钮，如“青世”“谢株”皆私印中所习见，无甚足异。后有“道光壬寅冬日汉阳叶东卿志诒借题记”。惜流传无多，世不恒觐耳。^[3]

从柴萼所记录的印章数量以及种类而言，此谱应与韩天衡所言为同一印谱，从文本内容来看，此谱多为汉印，这也与黄易的收藏相符合，而韩天衡所记印章要多于柴萼当时所记录的数量，这一点应与柴萼所记“谱无卷目”有关。因为印章的收藏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延续性，黄易未编其卷目，想必是为日后所获新印能够继续增补作出的深思远虑。将所藏印章不断收录于谱，不仅丰富了印谱的收藏体例，更增加了印谱的收藏价值，这也为日后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黄易收藏汉印，并取法汉印，在其印章边款中就记载了其对汉代铜铸印以及阴文双边印式的取法：

庚申大暑，小松仿汉。（“黄易之印”印款）^[4]

小松访汉铸，时乙酉四月。（“漫赢得幽怀难写”印款）^[5]

汉印有沈姓，“沈延年”“沈颐”“沈子卿”诸章，阴文双边亦汉人法也。隶吏黄易刻于济宁之尊古行斋。（“沈启震印”印款）^[6]

[1] 薛龙春著：《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21年版，第277页。

[2] 韩天衡著：《天衡印谭》，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

[3] 清·柴萼：《梵天庐从录》卷二十，中华书局1926年石印本。

[4] 书影见冈州氏双莲馆辑自藏印而成《双莲馆藏石》，1941年版。

[5] 书影见冈州氏双莲馆辑自藏印而成《双莲馆藏石》，1941年版。

[6] 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732页。

黄易将不同汉印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效果运用于自身的篆刻创作当中,同时他还指出:“汉印有隶意,故气韵生动。”^[1]这种对于汉印的独到见解,与其参与的汉印收藏活动密不可分,可见黄易的汉印收藏活动在其整个篆刻艺术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阮元在《小沧浪笔谈》中就曾论及黄易对汉印的取法:

小松为丁敬身先生高弟,篆隶铁笔,实有过蓝之誉。尝谓“刻印之法当以汉人为宗,萃金石刻之精华以佐其结构,不求生动而自然生动矣”,又谓“小心落墨,大胆奏刀”,二语可为刻印三昧。生平不轻为人作,虽至交亦不过得其一二石,作者难,识亦匪易,故当推为海内第一。^[2]

阮元认为黄易的印章与其师丁敬相比有过蓝之誉,黄易也常常论及刻印取法汉印,同时汲取金石碑刻之精华来辅佐入印文字之结构,从而使印文不求生动而自然生动,阮元借用黄易常言之语来论及黄易的篆刻,不仅突出了黄易对于金石文字的推崇,更反映了阮元对于黄易取法的认可,并将其推为海内第一。

在乾嘉金石收藏的大环境中,金石的存在无形中对黄易的印章产生了影响,黄易也曾指出刻印不只是单纯的娱乐行为,而是把他当作检验自身金石学养的标杆,在“金石刻画臣能为”印款中有言:

古文篆隶之存于今者,惟金石为最古。后人摹仿镌刻,辗转流传,盖好古情深,爱奇志笃,非苟为适意遣兴已也。余宿有金石癖,有喜探讨篆隶之原委,托诸手以寄于石,用自观览并贻朋好,非徒娱心神,亦以验学力。因取义山语刻石,明臣所能为也。乾隆丙午,秋庵黄易并志。(“金石刻画臣能为”刻款)^[3]

黄易认为留存下来的古文篆隶金石最古,后人以此为参照进行模仿镌刻,不仅仅是为了适意遣兴,而是有着深刻的好古情怀。黄易爱石成癖,喜探讨篆隶之原委,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通过篆刻呈现出来。这一点在黄易的汉印收藏与仿刻实践中就有很好的体现,黄易的收藏不再是简单地占有,而是滋养其学力的重要养分,对于养分的汲取与吸收又通过篆刻实践呈现出来。

对于黄易印章的评价,黄易所刻“金石癖”一印,吴江杨澥另刻款识评其曰:“浑厚中藏刀法。置之汉铜印丛。亦当让司马出一头地也。”^[4]潘庭筠在《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唐黄易君墓志铭》中也言及:“生平精篆刻印,得秦汉之遗。”^[5]伊秉绶对于黄易的篆刻实践有着较高的评价:“篋中多蓄古器物,累累官印炎刘铜。出其绪余试雕刻,文何顾郑难为工。”^[6]以此我们

[1] 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734页。

[2] 清·阮元:《小沧浪笔谈》卷二,第557页。

[3] 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731页。

[4] 黄裳铭编纂:《浙派印论文摘》,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5] 清·黄易著,毛小庆点校:《嵩洛访碑日记》(外五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页。

[6] 清·黄易著,毛小庆点校:《嵩洛访碑日记》(外五种,清伊秉绶《留春草堂诗钞》卷一),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页。

可以看到世人对于黄易篆刻成就的高度认可，这也充分表明了黄易在篆刻上所作出的实践是成功的。

四、结语

黄易幼时处于金石收藏的家学环境当中，成年时期又受到丁敬崇尚汉印思想的引领。在乾嘉时期金石收藏的大背景下，黄易对汉印所作出的收藏似乎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内在脉络。作为一名收藏家，黄易亲身践行寻求汉印；作为一名篆刻家，他从汉印文字中汲取养分并运用于自身的篆刻实践当中。黄易将收藏助力于自身学力，其对汉印所做的收藏活动，不再是简单地收聚蓄藏，而是藏以致用。薛龙春曾指出：“金石收藏与研究是乾嘉学者的集体兴趣。”^[1]而黄易对于汉印的收藏与研究作为乾嘉学术动态的一个缩影，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学术环境，以及学术开展的新动向，同时也为收藏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以此推动金石收藏与研究的全面发展。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1] 薛龙春著：《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第2019年版，第13页。